

1866 年（清同治 5 年 丙寅 日本庆应 2 年）

11 月 12 日孙文在中国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（今中山市属）诞生。其谱名德明 幼名帝象 稍长取名文，字载之，号日新 后改号逸仙。曾用笔名中原逐鹿士、南洋小学生。其化名有陈文、陈载之、中山樵、中山二郎、高野长雄、张宣、吴仲、公武、高达生、杜嘉诺、艾斯高野、Dr·Alaha 等。中山樵为 1897 年旅居日本时所取，故后又称中山。其自署公文用孙文 在中国多称孙中山 日本则通称孙文 欧美称孙逸仙（Sun Yat-sen）。

1868 年(清同治 7 年 戊辰 明治元年)

是年 于上年 2 月即位的日本天皇睦仁于本年 1 月颁布王政复古诏书，成立新中央政府。10 月，改号明治。随着以萨、长两藩为主力的政府军击败德川幕府军，厉行资本主义改革，即明治维新。从此，日本逐渐崛起为世界强国。

孙文后来多次称赞日本明治维新，并对其成功原因、意义和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多有探究。认为：日本维新之前，以一穷弱之国，忽遇外患凭凌，“然能幡然觉悟，知锁国之非计，立变攘夷为师夷，聘用各国人才，采取欧美良法，力图改革”，不到三十年，即使日本成为世界六大强国之一，其获得成功，主要是用开放主义。并谓：“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，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。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。”而且相信：凭藉中国的地大人多物博，只要人人担当国家义务，学习人家的好

处，不过二十年，即可获取日本维新的效果。^①

是年 4 月，日本天皇在其发表的《安抚亿兆之宸翰》宣告：“（要）继承列祖之伟业”；“开拓万里之波涛，布国威于四方”^②。它确定了明治时代及其以后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基调，其侵略矛头首先即指向朝鲜、中国。

与此同时，以实行对外扩张，侵朝侵华为主旨的日本团体应运而生。

玄洋社 1881 年 2 月，由头山满、平冈浩一郎和箱田六辅在其原先成立的向阳社的基础上，联合几个小团体，在福冈县成立，以平冈为会长，其宗旨为：（一）忠于天皇，（二）热爱国家，（三）保护人民权利。其实际主张系实行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细亚主义，在朝鲜进行颠覆活动，企图吞并朝鲜；它活跃于中国大陆，千方百计要把中国的东北和蒙古乃至俄国的西伯利亚，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。头山满还主张先经营大陆，中国问题解决，朝鲜问题自然解决。^③

东邦协会 1890 年成立，旨在“详审近邻诸邦之现状，对外扩充实力，借以讲求泰西各国在东洋保持均衡之计”，由天皇拨给经费。首任副会长副岛种臣，随后副岛任会长，近卫笃磨任副会长。伊藤博文、大隈重信、小村寿太郎、大石正己、板垣退助、三浦梧楼、加藤高明、头山满、犬养毅、大井宪太郎、陆实、原敬、尾崎行雄、神鞭知常、牧野伸显、荒尾精等为其主要成员。该会

《孙中山全集》中华书局 1981—1986 年第 1 卷，第 280 页；第 2 卷，第 533 页；第 6 卷，第 197—202 页；第 11 卷，第 365 页。

《近代世界思想史讲座 8. 世界中的日本》第 12 页，转引赵军：《辛亥革命与大陆浪人》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1 年，第 39 页。

赵金钰：《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8 年，第 6 页。

于 1891 年 5 月出版会刊，1894 年 8 月改为会报，1914 年 7 月停刊，孙文曾于该会报 82 号发表重要文章。

汉口乐善堂支店 荒尾精等于 1886 年在汉口设立，后在宗方小太郎、山内崑、中西正树等人协助下，在北京、天津、重庆、福州开设支店，深入内地，搜集情报。^①

日清贸易研究所 1890 年 9 月，荒尾精于上海设立，自任所长，根津一为所长代理，宗方小太郎为学生监督。由农商大臣陆奥宗光供给经费。陆军部招募学生，聘请中、英教师，培养精通中国内情的日本学生。1894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，该所职员 19 人，毕业生 72 人都奔赴战地担任军事翻译，或潜入中国各地探听军事情报。^②

〔日〕东亚同文会编：《对华回忆录》商务印书馆 1959 年，第 468—469 页；黄福庆：《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1982 年，第 50 页。

^② 赵金钰：《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》第 7 页。

1894 年(清光绪 20 年 甲午 日本明治 27 年)

6 月上旬 日本加紧调动军队入朝，与应朝鲜政府请求进入朝鲜镇压“东学道”起义的清军对峙，中日关系骤然紧张。

6 月下旬 孙文由上海抵天津，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，建议实行改革；并以日本为例，认为中国通过改革，可以迅速谋致富强。^①。

7 月 25 日 日舰吉野等挑起千岛海战，日陆军向牙山进犯，揭开甲午战争帷幕。

8 月 1 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。9 月 平壤清军溃退，日军越过鸭绿江，攻陷辽东各城，肆行烧杀掳掠，并进窥山东半岛。日军所到之处张贴日清贸易研究所重要干部宗方小太郎起草的《山县有朋告谕》和《告十八省豪杰书》，前者佯称：“我军所敌清国军队而已，至于农商民无辜，毫不加害，却抚恤之如慈母视之。”又谓：“今本司令官观察地方情况，悯兵力杀害，民人涂炭，兹垂

^①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 1 卷，第 15 页。

非常仁惠，命我所管辖地方吏，令勿纳今年租税。^①后者则企图利用广大民众对清朝腐朽统治的不满，瓦解抗日力量，以迫使清政府战败屈降。略曰：“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，既有非命之德，又无功于中国，乘朱明之衰运，暴力劫夺，伪定一时，机变百出，巧操天下。当时豪杰武力不敌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，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。今也天定胜人之时至焉。”宣称：“满清氏之命运已尽，而天人与弃之因也。我日本应天从人，大兵长驱，以问罪于北京朝廷，将陈清主面缚乞降，尽纳我要求，誓永不抗我，而后休矣。”还号召所谓“十八省豪杰”，逐满清氏于境外，起真豪杰于草莽，而以托大业。^②

孙文决志举行反清起义。据他 1897 年 3 月发表在伦敦《双周论坛》的《中国的现在和未来》一文称：“只是因为无可救药的贪污制度的风行，这个制度受到他们满人统治者的保护，使得中国变成任何国家毫不费力的战利品，并且给我们何以很容易地败于日本人的手中作了解释。”因此必须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。^③

在同年撰写的《伦敦被难记》里也说：由于中国之人民被困于黑暗之中，故“近者日本命将遣师，侵入吾土，除宅居战地之人民外，罕有知中日开衅之举者。彼内地之民，或并不知世界有日本国，即使微有风传，获闻一二，亦必曰外夷之犯顺，而不信其为敌国之侵也。”^④ 1912 年 10 月 12 日，孙文在上海报界公会的

① 《山县有朋告谕》见桥本海关：《清日战争实记》第 5 卷，第 222—223 页，译文见戚其章：《甲午战争史》，人民出版社 1990 年，第 192—193 页。

② 见戚其章：《甲午战争史》第 193 页。
《孙中山全集》，第 1 卷，第 88—103 页。
《孙中山全集》，第 1 卷，第 51—52 页。

欢迎会的演说中又说：“如中国昔日，亦曾有海军，且有强有力之大战斗舰，过于日本，而甲午日本海一役，乃致败挫。自此而后，益复不振。则可知国家只有强兵利舰，亦不足恃。”^①

秋 孙文赴檀香山，于 11 月 24 日组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。据孙自称：“至甲午中东战起，以为时机可乘，乃赴檀岛、美洲，创立兴中会，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。”^②此举之受甲午战争促动，还见于孙文当时手订之《兴中会章程》。

①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 2 卷，第 497 页。

②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 6 卷，第 229 页。

1895 年（清光绪 21 年 乙未 明治 28 年）

1 月下旬 为策动国内起义，孙文从檀香山归国。据孙自述：“时适清兵屡败，高丽既失，旅、威继陷，京津亦岌岌可危，清廷之腐败尽露，人心愤激。上海同志宋跃如乃函促归国，美洲之行因而中止。遂与邓荫南三五同志返国，以策进行，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。”^①。

孙文于归国途中，“船泊横滨期间，曾在舟中向归国侨胞演讲逐满救国，为该埠售物行商陈清所闻。陈以报告侨商冯镜如、冯紫珊、谭有发（号奋初）等。镜如为横滨文经印刷店主人，生平行侠好义，又热心爱国，愤清政不纲，毅然剪除辫发，国人皆以“无辫仔”称之。紫珊为其介弟，亦营印刷事业曰致生活版所。有发为均昌洋服店司理。三人皆以笃信新学见称，闻陈清言船上有高谈反清复汉之异人，奇之，亟派陈重登该轮邀请总理登陆商谈国事。总理谓此船开行在即，不便登陆，授陈以兴中会章程及讨

^①《孙中山全集》第 6 卷，第 230 页。

满檄文一大束，令转交冯等照章设立分会。且谓广州不日起义，陈若有意参加，可到香港投効等语。镜如等得陈归报，遂召集少数同志为组织之预备，陈清于数月后赴香港谒总理投効，尝向镜如求助川资，镜如以三十元助之。乙未九会广州之役，有兴中会员陈清专任施放炸弹之工作，即此人也。”^① 2月初，孙文返抵香港。

2月21日，孙文、杨衢云等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建立香港兴中会，对外饰以“乾亨行”名义。因此时对日战争更迭遭惨败，故《香港兴中会章程》对清政府腐败情景作了更多的揭露和声讨。^②

是月，孙文结识日本志士梅屋庄吉。孙文回到香港后某日，在一个慈善团体举办的宴会上，孙文因其师英国医学博士詹姆士·康德黎之介绍，得识梅屋，并告：孙“因为有重大目的，所以停留在香港。”两天后，孙到香港中环梅屋所经营的照像馆访问梅屋。后来梅屋回忆这段情景时写道：“三十有五年前，一日于香港之敝屋始迎先生，兴酣，谈天下事，中日之亲善、东洋之兴隆，以及人类之平等，所见全同，为求其实现，先行大中华之革命，先生雄图与热诚，甚激我之壮心，一午之谊，遂固将来之契”。梅屋爽快承诺：“君若举兵，我以财政相助”。随后，梅屋迅即筹集资金，派人到澳门、新加坡、厦门等地为起义军采购军械。其间，梅屋还随孙文到广州建立起义秘密机关。^③

是月清北洋舰队因威海卫被日军攻占而全军覆灭。日首相

冯自由：《革命逸史》，中华书局，1981年，第4集，第14—15页。

② 冯自由：《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》，良友发行公司1928年上编，第7页。

〔日〕车田让治：《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——献身于中国的一位日本人的生涯》第71—73页；《悼词》、《永代日记》、《梅屋庄吉文书》、转见俞辛焯等：《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》，中华书局，1991年，第17页。

伊藤博文、外相陆奥宗光以清政府所派谈判代表张荫桓、邵友濂资格不够不与谈判，清政府乃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议和。

3月1日 孙文与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首次会晤，商请援助中国起义。据中川3月4日致日本外务省通商局局长原敬密函称：“本月1日，友人介绍清国人孙名文（西医）来馆。该人即前日呈文中所称，企图颠覆现政府人物之一”，据该人曰：“其党称‘兴中会’，即振兴中国之会。内有哥老会员等，但党员之数难以言明；且稍许行动，即被发觉，苟非确定起事时日，彼此间不得通信往来。然一旦起事，必四方响应。统领乃广东省海南岛人康祖诒（儒者，其著作被禁止印行）、原任神户领事吴（佚名，号汉涛）、曾纪泽之子、某等四人。”对于成功后谁为总统问题，“则告以尚未考虑及此。”彼称目前“缺乏兵器 因之前来商讨”，望能协助筹借枪炮二万五千、短枪一千支，“倘能承诺前述资助武器等事，则立即四处奔走，招募党员。”中川答以“小生职在通商贸易方面，概不涉及政治，故有困难。如足下企图可嘉，则小生亦当襄助。”中川认为“目下，清国民间人士稍受教育，且通外国事务者，咸不满于政府之施政，而尤不满于官吏之腐败。然仅就孙所云，尚不能无疑。纵令果如孙所言，其统领中亦无具十分才干、阅历及人望者，且各派之间无密切联系，起事顺序手段亦未定，终难确信其举事必成。……总之，目前情势，我邦尚无四方拓展扩充势力之余裕。假令于此方面举事，其结果为开放内地，我邦亦不能充分扩大通商而享其利益，实则为他国人尽力耳。然清国各港之西洋商贾，念此番战争之终局或可增开港埠，有利于通商贸易，彼等亦切望享其利益。纵令我邦商人无大利益，如和约中载入增开港埠 许诺内河通航等条款 岂非亦能大扬我国威欤？”

“上述或为末事，若清国聚兵于此坚决抗我，我使彼等举事于南，使有后顾之忧而杀其势，此一策也。”在该函中还谈到香港“议政局议员何启，虽不十分赞同我邦干涉，而余者则深望我邦予以声援。”^①

3月20日 李鸿章在日本马关春帆楼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、陆奥宗光开始谈判。

4月17日 中日签订《中日马关条约》。

中日甲午战争以《马关条约》的缔结为结局，对中国影响极大。孙文等决志发起起义，与此极为有关。他在《伦敦被难记》里谈到此次战后，“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，愈积愈深，多有慷慨自矢，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。”广州军队之被政府遣散者又多愤懑不平，“吾党于是急起而运动之，冀收为己用。各军士皆欣然从命愿效死力。”因而决定在广州举旗反清。^②1912年5月孙文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中也谈到“甲午中东之役后，政学各界人人愤恚，弟等趁此潮流，遂谋举事于广州”。^③

对于《马关条约》的严重损害中国和朝鲜独立的条款，孙中山在二十世纪初有过反对表示，1920年11月8日孙文在与上海通讯社记者的谈话中，更明确提出“应先要求取消《马关条约》，扶持韩人独立”。^④

△ 据是日日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致原敬函称：“孙文有时来馆，深望我邦予以声援。我固无干涉之必要，况彼内部诸事尚

《原敬关系文书》第2卷书翰篇，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，第392—393页。
译文见狭间直树等译：《中川恒次郎报告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信》，《历史档案》1986年第3期。

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卷，第52页。

③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2卷，第359—360页。

《孙中山全集》第5卷，第399页。

未妥商，党员人数亦无定算，举事之准备全无。然孙名文称，自澳门近傍运进兵器之计划已成功，只需本邦稍予声援，即可起事。又，近日来，广东三合会党似有活动企图，频传我邦攻广东，以乱民心，或亦为此。……又因孙文辈于暗中称，须获本邦支持，举事打倒官吏，故目前当地支那人对我邦怀有敌意。……总之，如孙名文等所言，使两广为独立共和国之说，不过空中楼阁尔。”“然如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等省自古与中央地方联络不通，加之土民性情不驯，故尔或有分离之日。然外国相互嫉妒，反使土民难得谋反之机。”^①

10月27日 广州起义机关被破坏 起义流产。孙文等逃出广州，29日抵香港。

11月2日 孙文听从顾问达尼斯律师的意见，与陈少白、郑士良乘日轮“广岛丸”离港赴日。^②

11月9日孙文等抵日本神户。据陈少白在《兴中会革命史要》中称：“到了神户就买份日报来看看。我们那时，虽然不认识日文，看了几个中国字，也略知梗概。所以一看，就看见‘中国革命党孙逸仙’等字样，赫然跃在眼前。我们从前的心理，以为要做皇帝才叫‘革命’，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。自从见了这张报纸以后，就有‘革命党’三字的影象印在脑中了。”冯自由《革命逸史》亦记载此事，并称：“总理语少白曰，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，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，意义甚

① 《原敬关系文书》第2卷书翰编2，第392—396页，《中川恒次郎报告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信》，《历史档案》1986年第3期。

② 《兴中会革命史要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《辛亥革命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，第1册。

佳，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。”^①

但据陈德仁、安井三吉先生查阅神户当时的报纸，仅 1895 年 11 月 10 日《神户又新日报》刊载《广东暴徒巨魁之履历及计划》一文。该文称，“该报前一天已刊载广东暴动消息。”此为日本报纸首先关心中国革命之报道，但其所列举事实，系据听闻，有实有虚，如称：“此次暴动首谋者范某，多年留学美国，归途中又在英、德两国滞留一年许，最近才归国，故颇有学识。”他“次第结交慷慨之士，常与谈论国事，其名声忽播四方。某渐纠合同志，与美国、濠州、新加坡等地归国者结成团体，阴谋颠覆清政府。彼又兼为三合会会员，该会不满于现政府的统治，对范自然敬慕，遂拥为首领。”该首领之方略“第一步占领广东。”此次暴动先由惠州、潮州、漳州同时蜂起，将广东提督兵诱往三地，然后，乘省府广东兵少空虚，以别动队突袭占领广州。”“范数月来向各方派遣密使，召集同志，布置严密周到，其同党源源而来。传说在闽粤各地，至少有三万同志，已准备好的新式武器可武装十三万兵勇”^②。

11 月 13 日 孙文于 12 日离开神户^③。是日抵横滨。据陈少白忆称：在船上，他们想到抵横滨后的居住问题，都很不安，后来孙文想起年前船泊横滨时结识的谭发，孙就“叫我们留在船上，他一人登岸据着住址，去找谭发，……谭发就替我们租了一个楼面。这个楼面很小，只有六席的一个房间，孙先生看定了，倒也很满

《兴中会革命史要》；冯自由：《革命逸史》中华书局，1981 年，初集，第 1 页。

② 〔日〕《神户又新日报》1895 年 11 月 10 日。

《神户又新日报》1895 年 11 月 12 日。

意。”^①一二日后，经谭发介绍，首访冯镜如于外人居留地^② 53 番地文经印刷店，“文经为经营外国文具及印刷事业之老商号，冯氏开设三十余年，在侨商中藉藉有名。既相见，欢若平生，即请总理下榻于店中二楼，并邀紫珊、谭发、梁达卿、黎炳垣（焕堉）。赵明乐、赵峰琴、温遇贵等十余人在文经二楼商组兴中会事。

11月17日 横滨兴中会成立。众举冯镜如为会长 赵明乐为管库，赵峰琴为书记，紫珊、有发、炳垣等为干事。“半月后复设会所于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 继续加入者有温荻 炳臣）郑晓初、陈才、陈和、黄焯文、黎简卿、陈植云、冯懋龙（后易名自由）等十余人，以懋龙年龄为最少，时仅十四岁耳。是时旅日华侨尚多目革命排满为大逆不道，故会员咸有戒心。”^③

11月下旬 孙文与陈少白到东京会见昔日在檀香山所结识之日本朋友菅原传（曾留学美国，在旧金山组织爱国同盟会）。^④“后少白由彼介绍于曾根俊虎（日本退役海军大尉，曾长期在中国从事调查和谍报活动）由俊虎而识宫崎弥藏 即宫崎寅藏之兄也。此为革命党与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。”^⑤

据孙文自述：他“与郑士良、陈少白同渡日本，略住横滨。时予以返国无期，乃断发改装，重游檀岛。而士良则归国收拾余众，布置一切，以谋卷土重来。”又据 1920 年冯紫珊给冯自由函称：“不料日清战后，马关和约已成，钦差领事再派。中山向叔（按指

① 《兴中会革命史要》

据松本武彦：《日本的辛亥革命遗迹与史料》（载《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》第 2 辑）考订，冯镜如店所在地当时尚称横滨外国人居留地，山下町系 1899 年后的统称。

③ 冯自由：《革命逸史》第 4 集，第 15 页。

④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 6 卷，第 230 页。

⑤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 6 卷，第 230 页，又据《宫崎滔天年谱稿》载：介绍陈少白与宫崎弥藏见面的是伊藤藤吉。

冯紫珊)陈及,他三人在日本不便,因他系国犯,倘钦差到任后,有权运动日政府将三人引渡;更有连累各会友不便之处,务须各同志筹五百元,俾他三人择路而逃云云。叔斯时请各同志商量办法,不料各人讲到签银两字,无一答应。叔再三问之,各人面面相向。……逼不得已,叔愤极出言大责,若各位不允集腋成裘,以救三先生出关者,就算我一人出之便是,即答应孙先生云:该五百元准明日十二点钟送上,决不食言。”“孙先生得五百元,一百交少白制衣转装,……一百交弼臣回港,三百中山回檀使用。”^①

11月下旬 孙文离日赴檀香山。

孙文离日后,陈少白应冯镜如请,迁至文经文具店居住,助冯镜如编辑英华字典。由于横滨兴中会员渐少提供会费,冯镜如等以经费无着,遂取消会所,凡有会务均假文经商店二楼开会决定。^②

^①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6卷,第230页;冯自由:《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》上编,第32—33页。

^② 《革命逸史》第4集,第15页。

1896 年（清光绪 22 年 丙申 明治 29 年）

1 月 18 日 日本志士宫崎寅藏（本名虎藏，号白浪庵滔天，之兄宫崎弥藏）至外国人民居留地 156 番地大泽酒铺访陈少白。此前，经一致教会牧师伊藤藤吉介绍，陈少白曾于上年 11 月 23 日（？）到横滨不老町 2 丁目福音会宿舍看望疗养中的宫崎弥藏。^①

是日会见情形，弥藏致寅藏函谈到，他们第二次见面后，陈少白“滔滔不绝地叙述了清国政府的腐败情形，说到在野志士对于这个问题的意向，终于论及中国革命不可避免的问题。……一会儿他又提出政治主张的问题，我只回答一句：我主张四海皆兄弟之论。他听此语后满面喜色。又滔滔不绝地加上自己意见，解释了四海兄弟主义。说：‘革命在中国已经萌芽。你何不积极地帮助它成功呢？’因此我才认识到他的确是一个革命党中的人士。”“我猜想可能是孙逸仙的党羽。……无论如何，这足以证明我们以前对中国的推测，并没有错误。不，不如说机会比我们所想象的

^①《宫崎滔天年谱稿》。

似乎还好一点。”他希望寅藏急速回国。

宫崎寅藏覆函对此感到“不胜鼓舞雀跃。”“然而细思此人对初会者这样的表露衷曲，大发议论，又这样推心置腹，那他一定意在日本人中寻求同志。由此看来，他的下场也许可以推想得到：不是落在××便是××那些所谓‘窝藏叛逆’的头子手中。他所苦心策划的大事业，行将变成日本浪人的玩物”，他们为他们心焦意躁、不审慎从事而忧虑，主张先远离陈少白，静观其言行，待机行事，不要将自己的隐晦的“苦心孤诣”，轻率告人，“以期他日之大成。”^①随后寅藏仍赴暹罗。

弥藏函中所提“对中国的推测”和寅藏函所提“苦心孤诣”的“所志”，指弥藏向寅藏几次吐露的“支那革命主义”即“人生在世”，必须掌握时代的大方向。……目前的世界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战场。强者逞暴，日甚一日，弱者的权利自由，一天天地丧失殆尽。……现在如不设法防止，则黄种人将永远遭受白种人的压迫，而这个命运的转捩点，实系于中国的兴亡盛衰。中国目前虽然衰弱，但地广人多，如果能扫除弊政，统一治理，并能善加利用，不仅可以恢复黄种人的权利，更足以号令宇内，行道于万邦。关键只在于能有堪当大任的英雄奋然而起。因此，我决意亲自进入中国，遍访英雄，游说他们共图大事。如果找到此人，我愿效犬马之劳来帮助他，否则，我将挺身自任。”他还说：“人人都说中国国民是尊古的国民，所以不进步，这个说法是非常不明智的。他们是以三代之治为政治的理想。三代之治的确是政治的最高标准，同我们的思想相近。他们之所以怀古，不正是为了大步前进

宫崎滔天著，林启彦改译、注释：《三十三年之梦》三联书店香港分店、花城出版社 1981 年，第 83—86 页。